

师德师风监测：理论、方法与实践探析

张艳国 钟成海

摘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对改进师德管理与评价提出新挑战新要求。基于证据驱动的师德师风监测，是教育管理者提高师德管理与评价科学性、实效性的有力手段。探析师德师风监测的理论、方法、实践维度，构建师德师风监测理论模型，明辨师德师风监测运行机制与技术路径，解决师德师风监测实践问题，明确师德师风监测实践要求，对于构建师德师风监测体系、创新师德师风管理与评价工作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师德师风；监测；理论；方法；实践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1]“教师大计，师德为本。”^[2]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是教师职业素养构成的第一元素。师德与师风是教师职业的“魂”与“魄”，是教师育人的“神”与“形”，两者“里”“表”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支撑，赋予教育事业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成为教育者“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力量^[3]。弘扬教师美德、树立教育新风是古今中外教育家的共识，也是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更是社会对教师的期待^[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5]“四有好老师”是新时代判定好老师的价值尺度和师德师风建设的风向标。如何掌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主动权，提高师德师风建设水平，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效能，成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持续步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制度文件为开展新时代师德师风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师德师风管理、评价工作作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重点、难点、堵点，在新时代呈现新动态、新内涵、新亮点。《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指出，各地各校要“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要位置，坚持多主体多元评价，以事实为依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全面客观评价教师的师德表现”。这为新时代改进、创新师德师风评价工作指明了方向。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名单的通知》，要求北京师范大学等10家基地建设单位“对照目标任务，围绕师德师风研究、示范性师德教育以及师德师风情况监测，建设专兼结合、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师德师风研究人才队伍，形成一系列高水平、能够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钟成海，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

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探索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经验模式,开发具有实效性的师德师风教育资源,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整体情况监测和分析评估,提高师德师风建设科学性”。师德师风监测成为增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科学性、实效性的新举措、新手段。系统研究师德师风监测的理论基础、方法手段、实践问题、工作规律,对于创新师德师风工作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师德师风监测的理论之维

美国评价专家古巴(Guba,E.G.)和林肯(Lincoln,Y.S.)将教育评价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测量和测验时期、描述时期、判断时期、建构时期。20世纪50年代,教育评价由“描述阶段”转向“判断阶段”,教育评价者开始将目光从描述教育结果与教育目标的一致程度转向对教育活动本身的价值判断。他们通过系统地收集和解释证据,持续提升教育决策与教育行为的科学化水平^[6]。教育监测正是在这一“证据驱动”教育治理模式下逐渐兴起。教育决策者通过持续关注与检测事物的发展样态,获取科学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为制定或遴选有助于从整体层面提升教育质量的政策、项目和产品提供依据,从而对教育系统开展必要的变革,提升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监测的本意是指监视与检测。在教育领域,它主要应用于教育质量监测。1964年,美国全国教育进展评议处制定了最早的教育质量监控方案^[7]。1969年,美国建立教育评价体系,实施“国家教育进步评估”,按周期持续监测全国基础教育的质量现状,掌握其发展趋势^[8]。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百多个国家和以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为代表的几十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大规模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活动。在理论上,教育质量监测的对象包括学生及与之相关联的教师、校长群体。但是,鉴于实际操作困难,目前各国在开展教育质量监测时针对的主要是学生群体。^[9]针对教师群体,尤其是师德师风

建设状况,开展监测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回顾教育质量监测产生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关注教育系统持续改进、关注教育决策与行为科学化、关注教育运行状况的证据收集是教育监测的重要特征,这为开展师德师风监测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1. 师德师风监测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道德是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表1)。这些学科聚焦道德研究,持续分化或交叉融合,实现学科迭代发展,形成一些新学科,如道德社会学、教育伦理学等。从不同学科视角认识研究道德,有助于我们科学掌握师德师风的发展规律、评价方法,从而为开展师德师风监测筑牢坚实理论基础。

师德师风监测的需求逻辑是:监测者通过前置观察和检测方式,系统收集师德师风发展样态证据,及时发现和处置师德失范行为,宏观掌握整个教师群体的师德师风状况,从而掌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主动权,更好地为教育决策改进提供依据。监测者在开展师德师风监测研究时,必须仔细审视师德师风监测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1)师德师风监测的对象是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它包括符合师德规范的行为和师德失范行为两个方面。(2)师德师风监测不仅监测个体职业道德行为,更加注重监测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状况。(3)师德师风监测在方法上强调观察与检测,更加注重科学性和实效性。(4)师德师风监测的目的着眼于整个师德师风建设状况的持续改进与政策优化。结合道德研究的多学科基础和师德师风监测的特点,经过分析比较,社会学和伦理学学科给监测者提供了更为直接有力的理论视角。

2. 道德社会学视角下的师德师风监测理论建构

由于师德师风行为不像自然物体的客观属性那样容易被量化,因此,监测者在进行师德师风监测时经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即:教师

表 1 道德研究的多学科基础比较分析表^[10]

道德研究的学科领域	道德研究的跨学科比较	道德研究视角	道德研究的主要范式
哲学社会历史观	研究道德的一般规律、道德与社会存在，特别是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研究不同阶级的道德规范	从社会意识的形式入手	思辨研究
社会学	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产生和功能	从社会现象的功能角度出发	实证研究
伦理学	既研究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又研究社会个人的道德品质，侧重于社会道德现象，着重研究人“应该”如何行为的问题	从概念、规范、范畴等对道德进行系统化、理论化表述	规范研究
教育学	研究道德教育	从教育过程出发	人文研究与实证研究
心理学	研究个体的道德品质规律，着重研究个人品德是“什么”的问题	从个体心理过程与道德行为出发	实证研究

职业道德行为究竟可不可以被监测？具体来说，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及其相关观测点可不可以被数据化？这是监测者收集师德师风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前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道德社会学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一门专门将“道德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道德社会学研究的是客观的、实在的道德行为事实。美国学者 R. 赫什指出，德性并非体现为抽象的道德原则，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具体方面：（1）愿意关心、帮助、保护他人。行动者不仅要有自觉、自愿关心他人的善心，而且需要具备了解他人心理和掌握一定社会知识的能力，以便能够正确判断他人的困难、需求，以及知道如何给予关怀与帮助。

（2）能够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道德准则之间经常相互冲突，因此，选择道德原则的过程，考验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能力，这比单纯关心他人要复杂得多。（3）能够付诸行动。基于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实施道德行为，把善心转化为善行，这是个人德性最充分的体现^[11]。在进行师德师风监测时，研究者必须把研究的着力点放在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层面，只有通过对外显现的、客观的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及相关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解释，才能客观地揭示教师个体及群体的道德状况和水平。

事实上，道德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视整体性分析、因果性分析和大规模现象统计分析的特征^[12]。道德社会学研究者在运用实证

方法开展道德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从统计学中分化出一种被称作“道德统计”的研究方法。擅长使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被人们称为道德统计学家。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事实服从于某种客观定律。为了发现和运用这些潜在规律，他们从人们的社会道德行为和日常习惯中寻找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查点，通过分类、点查和列表等方式，对道德事实进行精准归类、分析，推导出具有规律性的道德统计定律，帮助人们理解某一类道德事件的经验分布和比率，确定事件或行为发生的单位时间和平均数，测算一定时期的道德事件发展趋势，预测不同年龄群体的行为倾向，为制定道德公共政策提供重要依据，预防同类道德紊乱事件再次发生，从而促进社会道德生活有序进行^[13]。由此形成了关于判断和预测社会道德状况和发展趋势，为社会道德公共政策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的“道德景气监测理论”。这一理论与方法契合师德师风监测研究的科学化价值取向，为师德师风监测提供良好学科视角。

3. 教育伦理学视角下师德师风监测评价标准模式建构

在进行师德师风监测时，监测主体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便是：监测的内容是什么？用什么标准尺度去监测？能不能直接把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相关制度要求作为标准？显然，师德师风监测的对象是外显的职业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行为背后所内隐的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

德情感、职业道德信念。对此,教育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基本模式。(1)基于成熟的道德体系建立道德标准,如儒家道德体系、基督教道德体系、功利主义道德体系、道义主义道德体系。(2)基于“某些长期共存的健全伦理学体系间的重要共同点”建立道德标准,如各主要的伦理学传统和宗教传统所共同同意的“黄金律”和以它为基础的四条戒律,以及“四条戒律所引申的若干基本意义”^[14]。(3)基于“对社会制度的构想和对现实社会条件的考察”建立道德标准,如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等各种制度和社会现实。综合分析以上三种模式,从我们对系统化道德体系所要求的完整性或齐备性的角度说,第三种模式最为成功。它引导我们从某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去考虑具体问题,去反思我们的日常道德观念^[15]。这一道德善恶评价模式与马克思评价个人行为善恶的两个标准相吻合。马克思认为,评价个人行为善恶一方面要以自己所属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另一方面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完善为标准^[16]。由此可见,第三种模式是进行师德师风监测时值得参考的重要道德标准模式。

回答“监测者能不能直接把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相关制度要求作为标准”问题,结合对三种模式的思考,我们认为,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相关制度,可以成为监测主体制定师德师风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但这些制度所表达内容的充分性、标准的合理性,还有待完善和检验。科学制定师德师风评价标准,需要研究者将师德师风纳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制度框架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高度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道德困境立场去评估和考量,这也是师德师风监测追求合理性、科学性价值取向的内在诉求。

二、师德师风监测的方法之维

教育管理者对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期待很高,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看到,学校和教育主管

部门在使用建章立制、师德教育、过程监督、师德考核、定性评价等方式方法进行师德师风管理时取得了成绩,师德师风建设总体面向好。然而,师德失范问题散发、多发、屡禁不止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互联网等媒体的曝光以及舆论引爆下,师德问题被无限放大,教师形象逐渐被污名化、妖魔化,师德建设效果饱受质疑。这与党和国家对师德师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形成鲜明反差,使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局面被动。据统计,2019年4月至2023年8月,教育部共公布13批次、93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包括教师发表损害国家声誉言论、宣传错误历史观、收受礼品礼金、性骚扰学生、学术抄袭造假、违反教学纪律等各类师德失范行为,对教师职业形象和教育行业造成负面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师德失范行为禁而不止的被动局面除了与师德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之外,还要归咎于管理与评价方法失灵。找到科学有效的师德师风管理与评价方法,有助于师德师风建设主体及时主动地掌握师德失范情况和师德师风建设总体状况,实现师德师风管理与评价由“监督”到“监测”迭代转变。

1. 师德师风监测的方法基础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工程^[17]。师德师风监测作为一项教师职业道德管理与评价活动,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明确其整体结构要素,是开展这一活动的基础。按照工程方法原理,每一种工程方法的整体结构由硬件、软件和软件组成。硬件是活动进行必需的工具、设备、机器。软件是指这些工具、设备、机器的操作方法、程序、工序等。软件是人们对活动的科学管理^[18]。具体到师德师风监测这一活动领域,其硬件包括师德师风评价指标体系、师德师风测评量表、师德师风监测或数据采集平台等。其软件包括师德师风评价指标体系研制技术、师德师风量表编制及测量技术、师德师风行为观察与测量技术、师德师风监测平台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技术、师德师风评价技术等。其软件

主要包括师德师风监测主体及人员管理、师德师风监测技术研发、设备采购、活动运行经费管理、师德师风监测设备管理等。如何促进以上三个方面的师德师风监测活动要素在最大程度上集成优化,产出最佳效能,是监测主体所面临的一道十分复杂、专业的技术难题。

借鉴教育质量监测经验,结合文章第一部分关于道德研究的多学科基础分析,师德师风监测活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在本阶段,监测主体要完成三大主要任务。一是基于国家关于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有关政策,在教育伦理学、道德社会学等学科基础上,经过学理分析,制定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指标体系。由于不同学段和不同办学类型的学校在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要求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监测主体需要在反映师德师风评价一般特征的基本评价框架下,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评价维度和观测点,适应不同评价对象差异化的需求,实现师德素质结构“共性”和“个性”有机融合。二是基于心理学基础和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师德师风测评量表。为体现多元评价原则,监测主体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教师自评量表、学生评价量表、同行和上级评价量表,实现师德师风自评与他评有机统一。三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师德师风监测平台。监测平台需要具备动态监测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和录入与统计分析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相关数据的功能,实现“人测”与“机测”数据有机整合。(2)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监测主体

主要的任务是通过观察、问卷调查、监督、测量等方式采集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数据样本,它主要分为合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正常状态数据和教师道德失范行为数据两类,然后利用师德师风监测平台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总体判断教师职业道德情况,分析影响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因素,预测教师职业道德未来发展趋势,形成师德师风监测报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量表测量和机器监测受到特定时间和场域限制,不能在时空上全面覆盖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所以常规的观察、监督、问卷调查等方法不应放弃,而应该成为师德师风监测的有益补充手段和获取师德师风数据的重要来源。(3)改进阶段。本阶段主要任务是根据师德师风监测报告中反映的问题,改进师德师风监测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举措,优化师德师风建设相关政策。师德师风监测理论模型见图1。

2. 师德师风监测运行机制分析

师德师风监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明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在整个监测活动中所处地位及扮演角色,这是保障监测活动有序开展的基础。师德师风监测属于教育质量监测的一部分,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将其纳入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高等教育质量监测体系。这两项国家教育质量监测项目具有成熟的运行机制,在组织机构、技术保障等方面是师德师风监测的重要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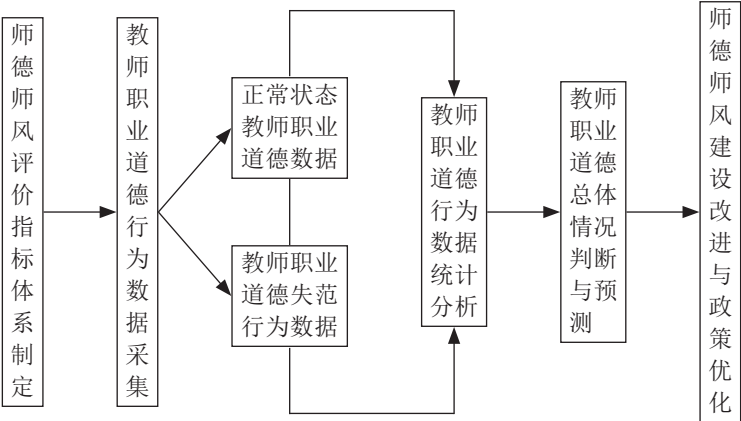


图1 师德师风监测理论模型

(1) 政府及主管部门是师德师风监测的组织方与指导方。作为一项大型教育监测活动,师德师风监测是一项人员覆盖面广、资源聚集度高、技术依赖性强的专业活动,需要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指导,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支持。以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为例,截至2020年5月,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省级监测机构。据不完全统计,28个地市级、90余个县区级监测机构也已正式建立^[19]。我国初步建立涵盖全国、省市、区县的多级监测网络,形成由“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监测的统筹规划和制度指导,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负责监测工作的日常组织管理以及从标准研发到形成报告的各项专业活动,省市、区县各级教育督导系统及相关职能部门机构负责本地协调和操作执行”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使教育质量监测体现国家意志,提高了教育监测活动的权威性和执行效能。

(2) 各级各类学校是师德师风监测的执行方与参与方。各级各类学校是师德师风监测的基本单元,教师群体是师德师风监测的主要对象。学校和师生参与师德师风监测活动的主动性,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以高等教育质量监测为例,我国依托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对全国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开展常态监测,同时为高校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和评估等活动提供数据支撑。按照教育部教育督导局要求,全国各高校每年通过国家数据平台上报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各高校、各省(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教育部深度分析采集数据,形成并发布系列质量报告。各类高校积极参与、严谨投入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使国家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发展状态的常态监测成为可能。

(3) 社会是师德师风监测的监督方和评价方。在社会化大生产与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社会与教育关系日益密切,社会群体在解决公共教育供给矛盾以及保障教育公平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多元化教育治理主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实现教育善治的重要保证。^[20]教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关涉千家万户的福祉。社会民众成为揭露师德师风问题的重要监督力量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评价主体。理性倾听社会舆论、真诚与社会互动,这不仅是师德师风监测活动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

3. 师德师风监测技术路径分析

师德师风监测作为管理和评价教师职业道德的一种手段,与现行的评价方法相比,具有技术集约和证据驱动特征,更加强调监测行为的目标效能,追求超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耦合的发展理性、技术理性^[21]。具体来说,其技术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传统技术与新兴技术相配合。目前,大型教育质量监测所运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测验法、问卷法、表现性评价、观察法、成长记录袋评价法^[22]。支撑这些方法的评价工具和研发技术,为师德师风监测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传统技术方面,我国已有研究者产出部分成果,如,廖政望编制了信效度较高的高校教师道德评价指标体系^[23];范勇、钱晓敏编制了信效度较高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评价量表^[24];冯莉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48名大、中、小学教师,从责任感和主动性两个方面进行职业道德行为的调查分析^[25]。但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研究者在运用观察法、表现性评价以及成长记录袋评价法研究师德管理与评价方面,还缺少标志性成果。这为师德师风监测提供了研究空间和技术增长点。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利用数据更好地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观念和设想逐步变成现实。将理论、实验和计算仿真统一起来的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与教育评价相结合,必然开创“数据密集型评价”,为专业化、智能化教育评价产生奠定基础^[26]。互联网+、云计算、移动APP、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实现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情景模拟、数据智能采集、

海量计算等功能方面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师德师风监测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27]。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有效选择监测方法,融合传统与新兴技术,有望为全景式、全过程、全周期师德师风监测提供可能。

(2) 坚持基础技术和关键技术相融通。分析师德师风监测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师德师风评价指标体系编制技术是整个师德师风监测活动的基础,它密切影响师德师风量表编制与测量、师德师风行为观察与测量、师德师风监测平台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师德师风评价等,在全局上影响师德师风监测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师德师风行为观察与测量技术、数据采集及处理技术等关键技术的前置技术。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指标体系缺乏广泛影响力和普遍效力,未在评价标准方面与师德师风量表编制、师德师风调查等方面形成一致的评价逻辑链条,这一缺陷背离师德师风监测活动注重整体性分析、因果性分析的内在要求。因此,打通指标体系编制基础技术与其它关键技术之间的逻辑链接,有助于打破师德师风监测数据孤岛效应,为搭建统一监测平台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3) 坚持人测与机测相融合。由于师德师风监测需要整体把握师德师风建设情况,对数据采集的时空覆盖程度要求高,完全依赖机器设备监测师德师风行为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因此,将人工监测技术和机器监测技术有机结合成为师德师风监测的现实路径。例如,西北师范大学冷宜隆基于 TOPSIS 的师德师风评估评判方法,构建高校师德师风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实时课堂监测与报警系统,用于监测教师课堂语音信息,如果教师负向信息超过阈值,监测系统则会发出警报^[28]。该系统可为高校师德师风中长期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对师德师风监测具有技术参考的重要价值,可以和人工监测方法与技术结合使用。此外,国外心理学界关于职业道德测量的量表编制技术也可以为开展师德师风监测提供测量技术支撑。如,以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莱斯特(James Rest)为代表的道德发展理

论对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提出挑战,用四成分模型取代了科氏的单一模型,弥补了科尔伯格阶段理论中缺乏对人们具体道德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测验和指导的不足,并提出中间概念测量(ICM),改变道德认知研究测量抽象道德原则的传统路径,进而转向测量从事特定职业群体的具体道德原则^[29]。中间概念测量量表编制技术有望与互联网+技术融合,为师德师风监测提供大规模测量基础数据。

三、师德师风监测的实践之维

人们要科学认识师德师风监测活动的本质及活动规律,达成师德师风监测的目标,必须深入师德师风监测实践,在实践中发现其现实困境、解决思路和工作规律。

1. 师德师风监测的实践基础

根据《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制度文件要求,教育监测制度要贯穿各级各类教育^[30]。结合上文关于师德师风监测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师德师风监测适宜分学段、分阶段进行,将基础教育师德师风监测和高等教育师德师风监测纳入各自所属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分别制定师德师风监测方案,按照监测工具研制、样本抽取、平台数据上报或现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师德师风监测报告研制、结果应用等环节有序实施。

在基础教育阶段,囿于监测技术、人员等资源的缺乏,师德师风监测活动的实施要更多依赖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组织、指导与支持。以福建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为例,省教育厅成立“福建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为省教育厅督导处、基教处、省普教室,质量监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普教室,建立行政主导、专业引领的工作机制,形成一支由普教室的学科教研员、设区市优秀教研员、骨干教师组成的监测队伍,由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评价测量人员组成的专家指导组,并聘请专业技术

人员提供技术支持。^[31]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高校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与人员优势,宜采用学校日常自主监测与国家各类专业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师德师风监测,进一步拓展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功能,建立师德师风发展状态数据库和师德师风评估专家库,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业务、技术和人才支持。

2. 师德师风监测的实践问题

监测主体在监测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监测方法和技术问题之外,还面临以下三对具体矛盾。正确认识这些矛盾,并找到合理解决路径,有助于我们提高师德师风监测效能。

(1) 师德师风行为的内隐性与采集数据的外显性矛盾。师德师风行为是指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教师职业道德认知是其产生的基础,教师职业道德情绪则是其动力因素。对于师德师风监测活动来说,监测者通过观察和测量师德行为,推断教师的职业道德认知和情感发展状况,判定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心理”推理活动。在实际中,监测者不可避免地面临两大障碍,即师德行为外显障碍和“心理黑箱”探寻障碍。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不一定因职业道德引发,教师的行为并不一直都是职业道德行为,监测者发现教师暴露的职业道德行为就是一件难事。这是师德行为的外显障碍,即观察方面的障碍。教师道德品质作为教师个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内隐的,难以通过行为去推测,这是“心理黑箱”探寻障碍,即测量方面的障碍。这两大障碍与师德师风监测活动需要大量外显的、客观的数据作为支撑的这一实际需求形成矛盾。因此,在进行师德师风监测时,监测者一方面要同时兼顾教师日常行为观测和教师失范行为的监督,使监测活动既能全面覆盖教师行为,又能有的放矢。聚焦职业道德行为,特别是师德失范行为,从而增加发现与记录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几率。另一方面,监测者需要虚心借鉴心理学关于品德测量的方法,

如广泛被采用的确定问题测验法(DIT)^[32]和正在兴起的中间概念测量法(ICM)等,探寻“心理黑箱”,为测量师德师风行为、采集师德师风行为数据筑牢基础。

(2) 师德师风行为的非逻辑性与数据分析注重因果逻辑矛盾。师德师风行为表现出很强的个体差异性和自发性,被监测者观察到的师德行为往往看起来逻辑关联度低,甚至是毫无关联的“碎片”。被记录的师德师风数据多以图形、文本、音频、影像等形式储存,难以用统一的二维表结构进行逻辑表达,数据呈现非结构化特点。这就给数据处理技术提出了很高要求,也给注重因果性分析的师德师风监测带来很大挑战。因此,师德师风监测一方面必须借助挖掘技术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提炼处理,提高原始数据的利用率,过好“数据关”;另一方面,师德师风监测必须强化数据循证理念,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监测赋能,过好“算法关”。在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方面,图像、声音等数据挖掘技术已基本成熟,很多商业搜索引擎都已开发相关产品^[33]。应用较多的非结构化数据挖掘技术主要集中在文本挖掘领域。例如,由Megaputer公司开发的TextAnalyst是一种智能文本挖掘和语义信息搜索系统,可以实现自然语言文本的结构化处理,可以用于创建知识库、搜索语义信息和自动抽取文本^[34]。在提高算法、算力方面,以容纳海量信息的大数据为证据要素,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使用等环节实现数据驱动的数据循证,成为重要的评价理念和方法。同时,伴随教育数字化进程加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有望为教育评价中的大数据处理提供强大算法、算力支持^[35]。

(3) 师德师风行为的分散性与师德监测的数据整合性矛盾。师德师风监测涉及的要素资源密集、实施过程复杂、监测方法多元,观察和测量的师德师风行为,往往源自不同的监测主体、监测时段和监测场域,这些大量分散的职业道德行为,具体表现为纷繁复杂的多源异构性数据。如何将大量的数据进行清洗、

集成、约简等预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综合判断,将直接影响撰写师德师风报告和达成监测目标。根据教育监测经验,经过数据采集与处理阶段后,监测主体通常需要建立分析型的数据集、数据库或数据平台。比如,对于小型的监测评估项目,通常可以从业务数据库中抽取经过设定的数据集或数据子集。对于大型的监测评估项目,则需要建立专门的分析型数据库或监测数据仓库,以便长期监测相对稳定的教育状态。对全国范围内超大型监测评估项目,则需要建立数据平台。这种大型数据平台不是孤立的数据仓库,而是整合了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挖掘和呈现等综合功能的数据中心。随着云计算发展,基于云的监测数据平台成为监测评估的重要数据来源^[36]。因此,在进行师德师风监测时,监测者需要根据监测规模建立功能各异的数据集、数据库或监测平台,对各类分散的统计数据、调研数据、测验数据、行为数据等进行归类、整合、处理、分析,为整体掌握师德师风建设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3. 师德师风监测的实践要求

师德师风监测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它旨在掌握教师群体职业道德发展状况,及时发现师德失范行为,优化师德师风建设政策,促进教育系统变革。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监测主体开展师德师风监测时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提高监测效能。

(1) 平衡师德师风监测方式与师德师风建设基点的关系。师德是教师的修养,强调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是教师职业的内在道德规约。师风是教师的风度风范及其职业风尚风气,强调以情感人和以行化人,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外在展现。两者均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情感色彩,它们一起构成教师职业伦理规范及其道德实践的精髓。由师德师风的人文特质所决定,师德师风建设的生长基点是由一定经济社会关系下形成的师德认同发展而来的师德自觉。师德自觉奠定了师德师风发展的精神高度,影响师德师风监测的丈量刻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教师

对师德素养的自主构建、自主发展,师德师风监测才有实际的监测对象,即处在一定发展样态中的教师职业道德状况和水平。这一生长基点,不仅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师德师风监测的逻辑起点。目前,教育评价处在建构性评价的第四代评价阶段,它对传统教育评价方式排斥价值的多元性、过分推崇科学范式、官僚主义倾向严重的弊端进行反思批判,认为评价过程中的“发现”或“结论”,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互动性的探索中逐渐被创造出来的,其方法论前提是解释学的、辩证的^[37],其具体方式是质性的、人文的,必须更多地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成长记录等方式,依靠人的感官和思维器官来做研究和评判,但它不排斥量化研究方法。因此,师德师风监测需要顺应第四代评价注重“价值多元”“民主协商”“共同构建”“人文关怀”等时代要求,关注教师师德自主培养、德性自主构建、评价自主参与,从而实现发展性评价、增值性评价。例如,我国在开展教育质量监测时,广泛采用表现性评价、深度访谈等形式,突破了纸笔测验带来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阂,融入情感互动、共同协商元素,体现了人文关怀。芬兰在开展学前教育质量监测时,主要采用问卷、访谈等调查方法,强调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重视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与意见收集。这些具体案例和方法积累的经验,为师德师风监测提供了有益借鉴。

(2) 平衡师德师风监测过程与师德师风建设伦理的关系。在师德师风监测过程中,监测者与监测对象以及监测者与监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成为影响教育监测效能的重要隐性变量。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由监测者违背监测伦理规范导致的工作伦理失范问题,如“一团和气”监测、“先入为主”监测、“居高临下”监测、“不负责任”监测等。有的是由监测方式和监测技术使用不当引发的技术伦理问题,如算法歧视与不透明、技术滥用与依赖、数据隐私泄露等;还有的则是监测对象或利益相关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导致的伦理失范问题,如虚假参与、人情招呼等。如果监测

者不能妥善处理这些伦理关系，往往会引发一些由伦理问题带来的监测失灵问题，影响监测效能。根据教育评价国际经验，很多国家制定了权威性教育评估的规范或专业标准，伦理规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譬如，美国评价协会（AEA）制定《评价人员指导原则（1995）》，从收集资料、能力、廉洁与诚信、尊重他人、社会与公众福祉的责任等方面，明确规范评价人员的行为^[38]。因此，监测主体一方面要关注师德师风监测过程的技术路径，提高监测活动的科学性、实效性；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师德师风监测过程的实践伦理路径，尊重教师，关怀教师，遵守规范，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秉承“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五大科技伦理原则，实施或参与监测活动。

（3）平衡师德师风监测目标与师德师风建设目标的关系。师德师风监测不仅关注师德师风建设总体样态和师德师风生态系统发展趋势，而且注重发挥师德师风监测的诊断与改进功能，推动教育系统变革，为优化教育决策与政策提供依据。其根本目标在于发掘影响师德养成的深层次原因，找到化解师德成长难题的路径，“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人”，助推教师成长为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着力培养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师德与师资基础。这与师德师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统一的。诚如著名教育家、德育学科的奠基者鲁洁先生所言：“人的‘神化’和‘物化’曾是道德教育的指向。教育要使人成为人，是人性的觉醒和教育的回归。”，“道德就是要人循着做成一个人的目的去生活，就此而言，道德就是成人之道”，“它关系到做人的根本目的和方向”，“它所关注的是怎样使人活得更像一个人”^[39]。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是“成人之学”，道德是“成人之道”；“成人”“立人”“树人”是教育领域任何实践活动的根本旨归。因此，师德师风监测实践活动

如果没有“教育人学思想”指导，很容易走上唯数据主义、唯技术主义歧途，背离“立德树人”根本宗旨，使监测活动偏离服务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轨道，加剧“技术异化”，降低监测效能，影响师德师风建设成效。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对立的原则和概念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着的。”^[40]师德师风监测注重数据循证、证据驱动，整体把握教师群体师德师风发展状况，这是对以往过于主观化的师德管理与评价方式的矫正。实践者正是在平衡使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传统与新兴技术、外在规约与内在构建方式等这些对立统一的原则与方法的过程中，实现监测主体与监测客体的内在统一，从而增强监测活动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科学把握师德师风监测的理论、方法、实践维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师德师风监测体系，我们就能为推进教育强国战略贡献师德管理与评价改革的丰富智慧，注入新时代师德文化的内涵活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N]. 人民日报，2014-9-10（1）.
- [2] 林崇德. 教师大计师德为本[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9-12.
- [3]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李迪的教育美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7.
- [4] 张艳国. 本科师范教育改革发展研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380.
-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5-30（1）.
- [6] 涂艳国. 教育评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1-33.
- [7] 王毓珣. 国外教育质量监控述评[J]. 外国教育研究，1999（6）：23-26.
- [8] 李凌艳，蔡静，郑巧. 美国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制度设计及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2016（5）：43-49.

- [9] 杨涛, 李曙光, 姜宇. 国际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实践与经验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2-19.
- [10] 林崇德. 品德发展心理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 2-6.
- [11] 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 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52.
- [12] 宣兆凯. 道德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57.
- [13] 丁大同. 道德统计与道德景气监测理论 [J]. 现代哲学, 2001 (2): 80-85.
- [14] 孔汉思, K. 库舍尔.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 [M]. 何光沪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12-26.
- [15] 贾新奇. 教育伦理学新编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17-24.
- [16] 冯益谦, 谢文新. 教师职业道德导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3.
- [17] 田鹏颖. 社会工程哲学教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5.
- [18] 李伯聪. 关于方法、工程方法和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 (10): 41-47.
- [19] 陈慧娟, 辛涛.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演进与未来走向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 (4): 42-52.
- [20] 林靖云, 刘亚敏. 我国教育治理中的社会参与: 困境与出路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 (11): 44-50.
- [21] 赵建军. 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10): 48-51.
- [22] 边玉芳, 梁丽婵. 中国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丛书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2.
- [23] 廖政望. 高校教师道德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 [D]. 湘潭大学, 2008.
- [24] 范勇, 钱晓敏. 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评价量表的编制与验证 [J]. 教师教育研究, 2019 (5): 105-110.
- [25] 冯莉. 中国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调查分析 [J]. 上海教育科研, 2006 (4): 4-6.
- [26] 朱德全, 吴虑. 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专业化何以可能: 第四范式视角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9 (6): 14-21.
- [27] 朱成晨, 闫广芬. 现代化与专业化: 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新技术推进逻辑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 (5): 75-80.
- [28] 冷宜隆. 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评估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J]. 现代信息科技, 2022 (13): 130-135.
- [29] 张倩, 杨韶刚. 中间概念测量的历史嬗变与开新 [J]. 教育学报, 2019 (4): 35-42.
- [30]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EB]. 国务院公报, 2020 (7).
- [31] 郑云清. 福建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J]. 福建教育, 2015 (23): 13-15.
- [32] 张倩, 杨韶刚. 从 DIT 到 ICM: 道德判断测验的变迁 [J]. 教育学报, 2017 (4): 98-104.
- [33] 王战军. 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理论与方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88.
- [34] 程志, 黄荣怀. 文本挖掘及其教育应用 [J]. 现代远程教育, 2008 (2): 71-73.
- [35] 朱德全, 彭洪莉.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与技术路径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216-225.
- [36] 王战军. 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理论与方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59.
- [37] 涂艳国. 教育评价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8-40.
- [38] 周作宇, 张红伟. 论高等教育评估中的伦理问题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9 (6): 5-10.
- [39] 鲁洁. 做成一个人——道德教育的根本指向 [J]. 教育研究, 2007 (11): 11-15.
- [40] 埃德加·莫兰. 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 [M]. 陈一壮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
-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师德监测、惩处与结果运用研究 (JD22106)]
- [责任编辑: 陈立民]